

## 情報領袖與派系政治—— 從國史館新進史料觀察戴笠和CC系 勢力的競爭

王良卿\*

### 摘 要

本文主要依據2010年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移轉給國史館的《戴笠史料》（原稱「戴公遺墨」），旨就戴笠與CC系勢力的關係史實，進行學術性的初探。第一部分，根據《戴笠史料》、《蔣介石日記》等新資料，對於三民主義力行社解散前的內部動態及與CC的對應關係，提出新的觀察線索。第二部分，就抗戰期間的郵電檢查、運輸統制、貨運管理等工作，管窺戴笠面對CC、中統的競爭，對於人事與事權的堅持。第三部分，透過蔣介石、戴笠的個人檔案，介紹戴笠舉報CC、中統事涉脫軌行為的若干材料，以及蔣的對應態度。內揭情節，約莫可以顯示地方政治與情報工作圈裡的濃厚宗派意識，這些一手材料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蔣做為最高仲裁者所扮演的角色。

一般而言，抗戰期間國民黨內的政治鬥爭往往是在資源緊縮的情況下變得尖銳、惡化，本文則是願意指出，相較於其他的政治表現場域，戰時國民黨中國的情報事業，無論是就其肩負的正常與非常的使命而言，或是就其活動的部門與腹地而言，反而經常呈現「擴充」的傾向，而非緊縮、有限的。正是因為這種「資源擴充」，我們才看到了國民黨中國特工事業內部更多的

---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國史館館刊 第 33 期

政治對立。

關鍵詞：戴笠、軍統局、蔣介石、情報工作、CC

# Competition about the Intelligencers in Factional Politics: Dai Li's Struggle Against the CC Clique

Liang-ching Wang<sup>\*</sup>

## Abstract

There were two main intelligence agencies i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Kuomintang in 1930s'-1940s' China. One was the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Juntong*) in Military Commission, the other was the organization which controlled by the CC clique of the Kuomintang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As an important leader of *Juntong*, Dai Li would do his best against the CC clique to make Chiang kai-shek keep an eye on him.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Juntong* and the CC clique was the kind of factional politic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issue with newly open archives held by Academia Historica and the Diary of Chiang kai-shek held by the Hoover Institute.

This paper concerns not only competition between *Juntong* and the CC clique about postal inspects, transportation controls, and freight managements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but also Dai's report about the CC clique's undisciplined. In general, the reduction of Government resources was the main reason for struggle between different cliques. According to this paper, the resources of wartime intelligence did not reduce but expand, however the struggle of factional politics also existed.

**Keywords:** Dai Li, BIS (*Juntong*), Chiang Kai-shek, Intelligence work, CC clique

---

<sup>\*</sup>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國史館館刊 第 33 期

# 情報領袖與派系政治—— 從國史館新進史料觀察戴笠和CC系 勢力的競爭\*

王良卿\*\*

## 壹、前言

現代中國的情報事業，經歷了一個從傳統朝向現代化浸潤，並持續塑造的長期過程。直到今天，這個過程似乎尚未結束，某些堅定的傳統元素仍是框定情報工作做為現代政治專業的身分之餘，必不可缺少的活水與靈魂。<sup>1</sup> 無可諱言，國民黨中國時期的情報雙軌體制設計如軍統、中統之共賽共競，及其顯示的宗派圈子之分野，多多少少也讓人們看到了帝制中國時期若干類同的經驗表現，反映在現代中國政治，其功過何如，自是可待思考的嚴肅課題。

本文主要依據2010年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移轉給國史館，並於2012年正式公開的《戴笠史料》（原稱「戴公遺墨」），輔以《蔣中正總統文物》等檔案資料，旨就戴笠與CC系重要成員的關係史實，進行學術性的初探。戴笠，黃埔六期出身，曾參與三民主義力行社的籌建。在國民黨中國，戴笠所托寄的宗派圈子及其領導的特工隊伍，基本上是和陳立夫等CC系勢力有所競爭，多所頡抗，關係難謂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意見修改而成，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2年3月12日；通過刊登日期：2012年6月11日。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sup>1</sup> 關於國民黨中國情報事業的傳統成分，葉文心從「俠義」的角度提出了令人興味盎然的分析。葉文心撰，張和聲譯，〈城市中的戰爭與地下抗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特工秘密機構的俠義之風〉，《史林》，2004年第3期（上海，2004年6月），頁98-107。

交融。<sup>2</sup> 坊間憶述文獻對這個題材多有以零星個案為組合的片斷式著墨，惟整體脈絡仍欠明朗，敘事筆調惜多輕佻。平實而言，《戴笠史料》的出現，雖然不能完全彌補、修正這些缺憾，但是長期關注國民黨中國時期政治派系及其表現的學術工作者當能同意，《戴笠史料》確實是非常罕見的，至少足資做為相關史實探討基礎，以及與坊間憶述文獻進行史料對話的珍貴一手檔案——尤其當我們考慮到，它還是民國知名的情報工作領袖以手寫形式留存下來的電稿、批示、報告，價值不言可喻。

學者齊錫生曾經針對抗戰期間國民黨政權的派系緊張關係提供一個結構性的解釋方向，他認為戰時各派系力量大幅擴增，加上國民黨中央侷促西南一隅，政治資源相對減少，從事政治競爭者的活動只能限於中央和尚未被既有的地方實力派爭先攘奪到的少數省分及地方，因此，政治鬥爭在這種資源緊縮的情況下變得更加尖銳了。<sup>3</sup> 齊的觀點傾向於「資源有限論」，確實對戰時國民黨內部的政治衰微現象搭建了宏觀而富有思考價值的分析框架；本文感到好奇的則是，相較於其他的政治表現場域，戰時國民黨中國的情報事業，無論是就其肩負的正常與非常的使命，或是就其活動的部門與腹地而言，反而經常是「擴充」而非緊縮、有限的，那麼，如戴笠之情報工作領袖者，在這種情況下所涉入、所反映的派系政治，其樣貌如何？

本文主要根據《戴笠史料》為中心進行爬梳，就下列幾個較富意義的斷面提

---

<sup>2</sup> 1932年，黃埔軍校早期學生組成「力行社」為首的金字塔型組織系統，成功促使這批青年軍人邁出軍隊黨務、政治訓練、保安部門的傳統活動範疇，轉而朝向更為廣袤的非軍事領域發展。力行社成員也控制了國民黨中國時期一支重要的情報調查力量，即由戴笠領導，人所通稱的「軍統」勢力。CC系，是一個以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為中心而搏合形成的著名政治圈子，其內部也曾經擁有一個以「青白團」為首的金字塔型組織系統。1930-1940年代，誼屬CC系的分子在國民黨黨務組織部門占有優勢，並活躍在國民政府的教育、民政等領域，亦持續進取諸多公共部門與公共事務。他們也控制了國民黨中國時期另一支重要的情報調查力量，形成所謂的「中統」勢力。總體而言，力行社與CC系具有若干共同目標，諸如擁護蔣中正、反日、反共，肩負情報蒐集與制裁所謂奸宄等任務，但雙方合作紀錄有限，反而在諸多領域上迭起衝突。參見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頁16-30；王良卿，《改造的誕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頁53-54。

<sup>3</sup> 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p. 205-207.

出探討。第一部分根據《戴笠史料》、《蔣介石日記》等新資料，對於三民主義力行社解散前的內部動態及與CC的對應關係，提出新的觀察線索。特別是戴笠電文所透露的「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其成立動機、組織與運作實態，均有賴於學術工作者繼續追索。第二部分，就抗戰期間擴充發展的別動事業、郵電檢查、運輸統制、貨運管理等工作，管窺戴笠面對CC、中統的競爭，對於人事與事權的堅持。第三部分，透過《戴笠史料》、蔣中正個人檔案，介紹戴笠舉報CC、中統事涉脫軌行為的若干材料，以及蔣的對應態度。內揭情節，約莫可以徵見地方政治與情報工作圈裡的濃厚宗派意識，這些一手材料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蔣中正做為最高仲裁者所扮演的角色。

## 貳、「校座決不至拋棄吾輩也」： 關於力行社解散前的新資料

1932年4月1日，蔣中正授命戴笠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原密查組的組織基礎上，成立了三民主義力行社隸下的特務處。9月，軍事委員會成立調查統計局，陳立夫為局長，徐恩曾擔任CC原情報勢力（即1928年設立的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匯入至此的第一處處長，戴笠領導的力行社特務處則在形式上劃歸為該局第二處。事實上，特務處是一個祕密組織，所以對外正好能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的名義做為掩護。此外，《戴笠與抗戰》作者張需芝進一步強調，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政府機關，有正式的編制預算，可以解決特務處日益困難的經費問題。<sup>4</sup>

我們可以在前國防部情報局編纂的局史（《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以下簡稱《史要彙編》）看到，特務處的祕密性格和第二處的體制內特色結合後，使得戴笠的情報勢力獲得發展機會，而在1933年迅速開啟了一個從本部到地方的組織擴編過程。<sup>5</sup> 張需芝對此現象指出，這是因為特務處原本困窘的「經費問題」

<sup>4</sup> 張需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年），頁57-59。

<sup>5</sup> 國防部情報局編纂，《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62年），頁13-15。

經由軍統局的成立而「獲得解決」的緣故。不過，我們從《戴笠史料》當中倒是可以看到，戴笠的情報勢力在1933年的組織擴編潮當中，反而正是「經費問題」屢屢不到位，「無分文給領」，使得戴笠始終焦慮萬分，迭電蔣中正求援。此中關節，根據戴笠多次電呈蔣中正的內容顯示，與陳立夫所主持的軍統局經費經常緩發、截發、未發有關。

第二處（特務處）的月領經費主要來自兩方面：一者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職掌經理之徐恩曾先生」，一者是軍政部軍需署。不過，這時戴笠逐月請求蔣中正代為催款的電報裡，經常出現「徐竟向該行止付」、「迄今分文未發」、「既無款以給領，亦迄未明示」的句子，據稱「各地工作人員之生活幾瀕絕境」，對於「被捕人員之營救與某種工作之進行」同樣「待款甚急」。<sup>6</sup>直到年底，戴笠終於向蔣大膽剖陳自己的隊伍在當前幾支情報勢力之間落居財源下風的事實，憂慮之殷，溢於言表：「查徐恩曾先生之調查科既有黨部經費可以移墊，復有立夫、恩曾兩先生在社會之地位與其所經營之數家商店經濟可以活動，即鄧秘書文儀之三省剿匪司令部第三科與其行營之調查科，因前方經理處經濟狀況較佳，且鄧隨侍左右，與經理人員見面有情，其隸屬各省保安處諜報股之工作人員其經費又大都取諸於省府，故均不感困難。」續稱：「惟生既乏公開機關掩護，又無經濟權力，且歷來因抱定不敢欺騙鈞座之宗旨，故每有所知無不直陳，因是環境日益險惡，辦事諸感棘手，而仰體鈞座期望之深切與所負使命之重大，受良心之督責，工作復不敢後人，每為增進工作之效能計，對必需之款又不能不設法給與，但每當晉謁或書面呈報之時，因顧慮中央財政之支絀，尤不敢多事請求。生之困難甚矣。倘蒙召見軍需署所派之本處會計股長徐人驥，更必能洞悉生處經濟之實在困難情形也。生當此萬分困難之時，不能不向鈞座申訴。」<sup>7</sup>

和力行社、青白團（CC系的高層領導組織）所衍生的「社」、「團」之爭

<sup>6</sup>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3年2月3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1-0004-056；「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3年10月1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1-0004-049；「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3年12月13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1-0004-047。

<sup>7</sup>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3年12月13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1-0004-047。



的經驗類同，戴笠和陳立夫、徐恩曾所個別領導的情報勢力，一方面工作多有重疊，旁觀者不容易釐清其間權責之分際，局內人更多見罅隙呈露，加上派系意識既深，自易「動逞意氣」，即連蔣中正亦時時要以「切實合作」、「和衷合作」等道德性語言相勸。<sup>8</sup> 至於力行社這邊，蔣中正對這批黃埔學生的看法，則是從早先的「幼稚」、「小學生之難御」，<sup>9</sup> 到了「散漫」的評價，<sup>10</sup> 於是逐漸有了「整理」之念。<sup>11</sup> 及至1935年12月，亦即陳立夫奉令密赴蘇聯商談軍事互助之前，蔣中正已開始思考「力行與青白合併」的可行性。從蔣的手書日記看來，陳立夫（青白團）與劉健羣（力行社）很可能是最早被蔣告知，並與蔣交換過意見的兩位幹部。<sup>12</sup>

這件事對力行社的內部情緒造成了重大衝擊。根據《戴笠史料》顯示，蔣的黃埔學生們認為他們的團體即將被「解散」，否則至少也是要和一向並不友善的青白團進行「合併」。這時，即使像蕭贊育這批具有老黃埔資歷的幹部，也不免沾染了戴笠所稱「對『團體』前途未免過於悲觀」的情緒。憑著直觀與自信，戴笠告訴老戰友鄭介民，「校座決不至輕易出於解散或合併之辦法」，以「校座對革命之主張，與吾輩在今日革命所負之責任，校座決不至拋棄吾輩也」。不過，對於黃埔學生圈的「外人」劉健羣，戴笠倒是直接表露了不信任的態度，稱：「健羣對『團體』亦無誠意」。<sup>13</sup>

力行社1935-1936年之交的憂慮，在1937年抗戰軍興之前，以某種形式化為了真實，最終並在1938年導向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成立。有關三青團醞釀組建的

<sup>8</sup> 「戴笠致蔣中正電」（1935年7月12日），〈民國二十四年（三十九）〉，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237-096；「戴笠致李果謙電稿」（1936年，月份不詳，10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3-0001-024。

<sup>9</sup> 《蔣介石日記》（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藏），1932年5月31日、6月5日條。

<sup>10</sup> 《蔣介石日記》，1934年3月13日條。

<sup>11</sup> 《蔣介石日記》，1934年2月19日，11月18、25、27日條。

<sup>12</sup> 《蔣介石日記》，1935年12月12日條。

<sup>13</sup> 「戴笠致鄭介民電稿」（1936年2月9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1-0004-008。「外人」（outsider），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語，Frederic E. Wakeman,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72.

過程，目前學界尚未能清晰掌握。基本上，學者最為仰賴的資料，大多仍是力行社末代書記長康澤的回憶文字，以及學者鄧元忠於1970年代的口訪所得。<sup>14</sup> 近年來，《蔣介石日記》公諸於世，雖然也不能據以構建更清晰的細節，但多少得以印證前揭資料的若干敘述。例如：一、鄧元忠表示，1937年 5-6 月間蔣中正已授意某些力行社幹部草擬改組計畫，其中已有「三青團案」的組建構想。蔣日記：1937年 2 月16日，重新思及「力行、青白社之合併」；3 月 3 日，將「併組力行與青白社」列為本年要務；16日，預定「約健羣談力行社事」；6 月 3 日，注意「力行社之改組」；6 月中旬，思考預定要務，已有意在「國民黨中公開建立青年運動建立足以促成黨的統一健全之組織」。<sup>15</sup> 例二、又如康澤憶稱，同年秋天，蔣中正曾授意他和劉健羣與陳立夫針對一個想像中的「大組織」進行定期而密集的討論，隨後在一次涵蓋面甚廣的跨派系會議上，蔣公開宣示將組建一個名為「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查諸蔣日記，在11月 3，4 日兩天，確實是首次，並連續出現了「青年團之組織」、「研究青年團之組織」等字眼。<sup>16</sup>

根據《戴笠史料》所顯示的不完整訊息，這時劉健羣甚至還代表力行社陣營，與陳立夫方面進行某種形式的合作。我們閱讀《戴笠史料》所得到的粗略瞭解是：劉、陳二人「商妥」、「會呈」成立一個「領袖批准之『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的組織，其領導階層係由「黨方」（力行社幹部慣用語，意指政治立場、人事淵源近於陳果夫、陳立夫，並以黨機器做為主要發展腹地的CC系勢力。有時候，力行社成員所說的「黨部」也是這個意思）「指定幹部五人」，「吾方」（力行社）則「由健羣兄選派中」。<sup>17</sup> 同志會的組成，出於蔣中正的飭令最是可能，否則至少也是劉、陳揣摩蔣的某種意向或暗示所致；根據蔣中正的個人檔案，這位最高領袖甚至還為這個跨派系的組織平臺扮演了某種的指導角

<sup>14</sup> 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11月），頁197-207；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臺北：實踐出版社，1984年），頁669-672。

<sup>15</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2月16日，3月3日，16日，6月3日條，及（6月12日後）下週預定表。

<sup>16</sup> 《蔣介石日記》，1937年11月3、4日條。

<sup>17</sup> 「鄭介民、戴笠致賀衷寒電稿」（日期不詳），《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0-0007-048。

色。<sup>18</sup> 同志會的發起時間還不清楚，惟可確認的是：直到1938年2月底，它還存在著。<sup>19</sup> 關於同志會的工作宗旨，以此時而言，至少是和抗戰初期中央試圖保衛廣州的事情有關，即曾養甫所謂「協調各方，穩定粵局，增強抗戰陣線，紓鈞座（按：蔣）南顧之憂」，蔣亦以「黨政軍共同一致，鞏固革命根據地」相期。<sup>20</sup> 特別是當我們考慮到幾個月前，蔣中正還諄諄叮囑劉健羣、陳立夫等人，表示抗戰方興，過去祕密的小組織形式已不合需要，要來一個「大組織」，以資團結黨內各派系的話，<sup>21</sup> 那麼「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會不會是蔣在三青團的構想定案之前，更早所想像出的一個「大組織」以收「團結」之效，似乎大有玩味的空間，惟此仍待進一步的史料予以證實或修正。

無論如何，鄧元忠根據白瑜口訪結果指出，1938年力行社奉命解散、三青團正式成立之前，鄧悌、戴笠曾經公開指責劉健羣要將「組織」（力行社）交給陳立夫一事，證諸前揭檔案，似乎也就有跡可循。在力行社最後一次的幹事會中，許多人認為劉健羣有意將「組織」送給陳立夫，咸表不滿。鄧悌做此嚴厲批評時，曾獲全體掌聲，據說戴笠亦稱劉健羣有意挑撥離間，甚至對劉說出「你完了，做和尚去罷」的話。<sup>22</sup>

鄧元忠的敘述其實觸及了力行社解散之前，內部普遍瀰漫的一種不確定感、不安全感。今日學界對於「力行社」組織人事朝向「三青團」組織人事的移轉、變化，已有基本定論，不過，也許我們要避免將這種移轉變換看成一種機械式的、秩序井然、早已命定的規律，至少，力行社成員在三青團醞釀組建期的一段相當時間之內，無從預見這種規律。1938年1月24日，蔣中正思及「組織青年團」當「以力行社為基礎」，這顯示蔣的內心已決定將三青團的組建工作交給力

<sup>18</sup> 「戴笠抄呈曾養甫致蔣中正電」（1938年2月25日），與蔣的批示（1938年2月25日），均見〈呈表彙集（六十八）〉，特交檔案—一般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495-046。

<sup>19</sup> 「戴笠抄呈曾養甫致蔣中正電」（1938年2月25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495-046。

<sup>20</sup> 「戴笠抄呈曾養甫致蔣中正電」（1938年2月25日），與蔣的批示（1938年2月25日），均見《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495-046。

<sup>21</sup> 參見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頁35。

<sup>22</sup> 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頁671。

行社；<sup>23</sup> 但同時，蔣卻也一直是力行社、青白團二「團體合併」的說法，來為三青團的組建做出定位。<sup>24</sup> 因此，對於力行社幹部而言，實在不容易確認自己的組織解散後必定是三青團的主導力量。

正是在這種力行社成員的不安氛圍之下，康澤憶述文獻經常被學者引用的對話，以及《戴笠史料》出現的相關資料，似乎才真正有了值得參照的歷史背景：康澤先於3月初請示蔣中正是否可移植力行社「精神」至即將成立的三青團裡，及各地同志能否根據自我意願率先入團，獲蔣肯定答覆。<sup>25</sup> 4月8日，戴笠致電胡宗南，指出陳立夫「圖掌握已由臨時代表大會（按：國民黨臨全大會）通過之青年團」，為因應計，「弟主張中央軍校同學全體加入青年團，已得多數同意，校座諒亦可允准也」。<sup>26</sup> 4月下旬，康澤再度面請蔣中正確定三青團的「核心」，蔣始以力行社明確答之。<sup>27</sup> 直到5月上、中旬，蔣等於是在日記的私領域和正式指令的公領域中，一併再次確認了他對康澤的承諾：5日，日記稱，應注意「力行社與青年團之連接方法與整頓方案」；<sup>28</sup> 14日，電復康澤，力行社即行解散，凡成員願入三青團者，遵章另辦手續加入即可。<sup>29</sup>

### 叁、人事與事權： 別働工作、郵電檢查、運輸統制、貨運管理

1938年，力行社、青白團均受命取消，三青團代之而起。同一期間，國民黨中國的官方情報體制也正醞釀重組。這時，戴笠積極偵蒐陳立夫方面的動態，尤

<sup>23</sup> 《蔣介石日記》，1938年1月24日條。

<sup>24</sup> 《蔣介石日記》，1938年2月23-24日條。

<sup>25</sup> 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204-205。

<sup>26</sup> 「戴笠致胡宗南電稿」（1938年4月8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1-0002-060。

<sup>27</sup> 康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頁204-205。

<sup>28</sup> 《蔣介石日記》，1938年5月5日條。

<sup>29</sup> 「蔣中正致康澤電稿」（1938年5月14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70100-00045-047；事略稿本，1938年5月14日條，〈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七年五月〉，《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128-014。

其關注CC所呈情報組織改制的各項建議。<sup>30</sup> 其間，戴甚至一度探得蔣中正有意讓徐恩曾放棄特工而令其前往西北擔任「某種名義」之消息，惟此說旋即證明「已成過去」。5月21日，戴笠致電香港區區長王新衡，非正式的提出了自己對於抗戰軍興以後，情報工作在面臨中共與知識界壓力的新階段裡，CC勢力似乎仍要繼續扮演某種重要角色的個人評估：「立夫始終不肯放棄特工，據弟推測彼方最近或更有趨於積極之情勢，因若輩始終自以為對共黨、對文化有辦法也。尚希兄多方注意為荷。」未了，戴笠勗勉他的得力幹部：「國難至今，吾人不圖今日特工之統一，惟必須力求本身能盡責，不負領袖之期望也。」<sup>31</sup> 對於情報雙軌體制的繼續存在，語間似已了然於胸，已有心理準備。及至8月，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原第一處改制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局），徐恩曾負實際責任；原第二處則是繼承了軍統局的名義並進行擴組，戴笠負實際責任。

抗戰期間，由於國家與社會的總體動員，以及戰事、民族主義所屢屢激揚的諸多非常使命，使得戴笠與CC方面的特工事業獲得了更多擴充的腹地，乃至相互產生了更激烈的競爭。在一些官方新設單位人事、事權的問題上，往往就體現了這種現象。例如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初期，戴笠相信別働工作果能配合正面戰場，「使敵失卻憑藉」，則必「勝券可操」，因此，「此時便衣隊之活動，到處擾亂，使敵疲於應付，實為迫切之圖」。<sup>32</sup> 不過在上海，刻正執行相關工作的別働隊伍，卻陷入派系政治的漩渦之中。根據戴笠的評價，這支隊伍雖然由上海市公安局長蔡勁軍（黃埔二期出身）兼任副司令並負實際責任，但「大部人員之召集與訓練經費之籌措均由杜月笙擔任，主持其事者為杜之門徒陸京士」。戴笠向蔣中正抱怨，誼屬CC的陸京士「恃杜為背景」，杜則「受陸京士之包圍」，非惟蔡勁軍不能充分號令，而且別働工作「迄無甚成績」。<sup>33</sup> 及至9月上旬，蔣中

<sup>30</sup> 「戴笠致鄭介民電稿」（1938年5月17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5-031。

<sup>31</sup> 「戴笠致王新衡電稿」（1938年5月21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3-0003-070。

<sup>32</sup>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7年8月17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2-0002-075。

<sup>33</sup>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7年8月17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2-0002-075；「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7年9月10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4-031。



正電令戴笠盡快與杜月笙磋商，組織浦東區、京滬與滬杭二線的便衣隊，以資破壞、擾亂日軍的猛烈攻勢。<sup>34</sup>很快的，這支新隊伍以「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名義成立了。根據蔣中正所核可的戴、杜協議，戴笠在委員會裡以常務委員的身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也同意由杜月笙所保薦的劉志陸擔任總指揮。劉具有會黨的背景和統率軍隊的資歷，與杜相稔。戴笠告訴蔣：「生曾與數次詳談，覺其人尚有勇氣有辦法，且對鈞座力表信仰，抗日情緒亦甚緊張。以劉與杜之關係，實可制止陸京士之跋扈也。」<sup>35</sup>揆諸實際，儘管陸京士仍然將其工人武裝轉入了委員會的別動隊伍，但在委員會的整體結構上，戴笠的影響力明顯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失陷後，委員會部分潰退的別動勢力，形成了「忠義救國軍」的前身。<sup>36</sup>

除了別動工作之外，「戴笠史料」也顯示，戰時的郵電檢查、運輸統制、貨運管理等部門，戴笠與CC系成員也就人事與事權問題有所競爭。根據《史要彙編》所反映的官方工作觀點，郵電檢查是「鎮壓反動，監視敵方間諜，防止危害國家，擾亂治安，破壞國防外交一切陰謀最有效之工作」，其實就是視為偵蒐情資的重要管道。<sup>37</sup>九一八事變後，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開始從事相關檢查。<sup>38</sup>1935年，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將這項工作轉變為公開的官方行動，成立第三處掌理檢查事宜，至於職司人員之派遣則是以第一處與第二處「平均遴員薦請委派為原則」。很快的，第三處即在華北、華中、華南、西北、西南等地一些位居交通輻輳的城市成立了多個檢查所，藉以執行業務。<sup>39</sup>

乍看之下，戰前的第三處在人事問題上展示了一種平均主義的原則，工作經費也是由第一、二處各自負擔，不過《史要彙編》卻也指出了這個工作領域「組

<sup>34</sup> 「蔣中正致戴笠電稿」（1937年9月7日），〈淞滬會戰與南京撤守〉，革命文獻—抗戰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09-082；「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7年9月10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4-031。

<sup>35</sup>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7年9月10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4-031。

<sup>36</sup> 張霈芝，《戴笠與抗戰》，頁117-122；Frederic E. Wakeman,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pp. 246-249.

<sup>37</sup> 國防部情報局編纂，《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頁25。

<sup>38</sup> 楊者聖，《特工王戴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24。

<sup>39</sup> 國防部情報局編纂，《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頁25。

織指揮均欠統一」的怪象。<sup>40</sup> 事實上，CC是把他們在局本部的優勢延伸進了這個已有數年工作基礎的領域。例如戴笠所稱「黨部所派之應澤」（第一處出身，時任第三處的指導科科長），就屢屢將各地彙呈給局本部的材料預先透露給一處。根據戴笠的說法，應澤也主導了「人員之調遣與臨時辦公費等之支配，及上下行公文之處理等」。因此，戴不免要指責應「一手把持」，並且忿說相關工作「第二處固未獲參加一人也」。<sup>41</sup>

如果根據中統分子的回憶看來，戴笠的忿語可能不盡然符合事實，然而人們對於「黨部」力量占有優勢的評估，總不失為大致可信的輪廓，即《戴笠傳》作者良雄所稱「第二處人員仍佔少數，實權仍操於他人之手」之意。<sup>42</sup> 及至1938年8月，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制，中統、軍統正式分家，陳立夫以郵電檢查工作向來係雙方共同派遣，不便隸屬於新的軍統局為理由，堅持暫隸軍委會辦公廳並成立特檢處。這違反了戴笠的認知，因為戴認為「郵電檢查工作事屬軍事範圍」，亦即屬於新軍統的職司領域。雖然戴笠隨即取得蔣中正的面諭，特檢處可由軍統方面負責指揮，不過郵電檢查工作的舊人事力量依然存在，而中統持續「派員參加」的企圖心仍舊強烈，於是不免衍生了戴所稱「尾大不掉」、「磨擦難免」等現象，某種角度亦如良雄所言：此時軍統、中統兩局各負部分地區責任，「蓋有調停人情之意」。<sup>43</sup>

根據1940年初戴笠上呈蔣中正的報告顯示，郵電檢查工作的最大隱憂，似乎就在於派系政治伸入專業工作組織所帶來的利益均霑性格，及其可預期的混亂。他分析，特檢處除了讓舊勢力阻礙了工作效能外，還加上各地黨政軍機關「均思染指，紛紛派員參加」，且「各地黨部所派之郵檢員復有共黨份子混跡其間」，

<sup>40</sup> 國防部情報局編纂，《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頁2。

<sup>41</sup> 「戴笠致蔣中正報告稿」（1940年），《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3-019；楊者聖，《特工王戴笠》，頁124-125。

<sup>42</sup> 劉介魯、吳汝成，〈我們所知道的徐恩曾〉，收入柴夫主編，《中統頭子徐恩曾》（臺北：新銳出版社，1994年），頁87；良雄，《戴笠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頁299。

<sup>43</sup> 「戴笠致鄭介民電稿」（1939年10月10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5-032；「戴笠致蔣中正報告稿」（1940年），《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3-019；良雄，《戴笠傳》，頁299-300。

導致「成分複雜，指揮不一」，「此今日郵電检查工作徒耗國帑、增加糾紛之主因」。職是之故，「為整飭郵電检查工作、改進郵電檢查組織，以統一事權與節省人力財力起見，擬乞將軍委會辦公廳特檢處撤銷，改隸本局成立一科，所有人員、經費統交由本局負責整理。」<sup>44</sup>

另一方面，戴笠也試圖說服蔣，未來將會秉持「大公至誠」的原則，消弭特檢工作因改隸而可能牽動的派系紛爭：「今後本局於郵電檢查方面所得，有關於中央調查統計局工作範圍內之材料，當盡量移送處理也。至原中央調查統計局所派人員之接收，與今後之工作分配，本局當一秉大公至誠以處理，自信不至有多大問題。」並暗示：「如中央調查統計局方面認為該局所派人員本局不應接收、工作不應統一者，則同志之團結無期，國家永不能統一矣。」<sup>45</sup> 其後，戴笠的改隸建議雖未獲得採行，但蔣實際上支持了其「統一事權」的觀點。1940年，黃埔一期出身，兼具警界資歷的劉璠執掌了特檢處，受軍統「指揮考核」，全處人事則有所重組，《史要彙編》遂稱「本局兼理郵檢工作，至此規模大具，事權統一」。<sup>46</sup>

抗戰時期，基於安定後方的需要，使得戴笠的情報隊伍也被賦予了監察交通運輸、緝私、供應物資等項任務，有助於軍統實力的多面擴展。例如1940年，軍事委員會根據戴笠面見蔣中正的建言，特將「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簡稱西南運輸處）」改為「運輸統制局」，下設「監察處」，職司監督運輸與維護運輸安全。<sup>47</sup> 該處起初是以前西南運輸處主任曾養甫為處長，而由前西南運輸處警衛稽查組組長張炎元（軍統成員）為副處長，負實際責任。在國民黨官場中，曾養甫是極少數自大學至研究所時期都和陳立夫同校同習礦冶的政治人物，被陳視為「我最友好的同學」之一。<sup>48</sup> 沈醉《軍統內幕》一書指出，監察處成立之

<sup>44</sup> 「戴笠致蔣中正報告稿」（1940年），《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3-019。

<sup>45</sup> 「戴笠致蔣中正報告稿」（1940年），《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3-019。

<sup>46</sup> 《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頁2。

<sup>47</sup> 《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頁73。

<sup>48</sup> 兩人均自天津北洋大學、美國匹茲堡大學畢業。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頁27、33、36。



初，蔣中正就要曾養甫與軍統合作，而曾的作風完全不同，「他對這個處長並沒有興趣」。<sup>49</sup> 不過，《戴笠史料》倒是顯示，曾養甫就職後，和軍統局督察室主任劉培初、胡天秋（後出任監察處組長）有過一席談話，據稱他「決心幹去」，且主張從桂永清（力行社成員）所主持的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調人，所謂「用人唯賢」云云。戴笠聞後，認為「大可玩味」，「足證其此次毅然就監察處長職者，必事前受黨部立夫、騷先（按：朱家驊）諸先生之慫恿，而率真（按：桂永清）亦向其活動為其學生找出路也。」為了避免「今後監察處之複雜與糾紛」，戴笠要求劉、胡二人一面將軍統成員「先行併入辦公」，一面敦促曾養甫「迅行遵照交通會議所議決者」，先行接收軍統成員影響下的「交通、軍政兩部在各地之檢查督察各機關」，而後再行斟酌吸收「外來人員」。<sup>50</sup>

此外，抗戰期間，物資供應愈感短缺，蔣中正乃有對淪陷區搶購搶運物資，挹注後方的經濟決策，並於1941年指定戴笠稟承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之命，切實辦理，惟孔始終認為國民政府執行對敵經濟作戰的機構已所在多有，再無設立駢枝單位的必要，導致相關籌備事宜一再遷延。1941年，戴笠接獲蔣中正批示「以設局辦理為宜，並須從速負責辦理」，遂令王撫洲負責籌備「貨運管理局」。<sup>51</sup> 接下來，軍統籌備貨運局的步伐似乎仍舊因為國民政府內部的專業異見而顯得顛仆；有時候，這些異見難免也涉及政治派系為防杜對手力量擴張不止而形成的「攔油索」心理。直到1943年3月9日，財政部才將貨運局的組織規程提報給行政院院會討論。席間，誼屬CC的教育部長陳立夫、交通部長曾養甫、交通部次長徐恩曾「三先生均持異議，謂搶購物資並無可能，何必設此機構徒耗國帑」<sup>52</sup>，即連「孔先生亦未作可否意見」<sup>53</sup>。戴笠告訴蔣中正：「查此事生因迭奉鈞命負責兼辦，故不得不勉效馳驅，籌備已近一年，因有種種關係迄未實現。

<sup>49</sup> 沈醉，《軍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頁139。

<sup>50</sup> 「戴笠致鄭介民並轉劉培初、胡天秋電稿」（1940年4月26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3-005。

<sup>51</sup> 張需芝，《戴笠與抗戰》，頁230-231。

<sup>52</sup>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43年3月14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4-019。

<sup>53</sup> 「王撫洲電文摘由紙」（1943年3月13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0-0001-050。

現此案已在行政院擱置，應如何辦理之處，伏乞鑒核示遵。」<sup>54</sup> 結果，蔣在兩天內迅速做了回應。貨運局設置案在下一次的行政院院會中獲得通過，4月正式成立，戴笠兼任局長，王撫洲專任副局長，負實際責任。

在抗戰的最後階段裡，戴笠的搶購搶運事業，究竟在總體的面向上取得多少的成就，自是可待討論的議題。事實上，戴笠在兩個多月後一度向蔣中正提出的辭職書裡，就詳述了經濟作戰機構龐雜、職權凌亂的情況，「幾乎每一物資，均有一主管機關；每次搶運，均須另辦一次手續。重複淆雜，牽制疊架，而使一般商民莫知所從」，「以此而言經濟作戰，對敵爭取物資，雖有智者莫能為力，以生愚魯，曷克有濟？」這等於是坐實了孔祥熙、陳立夫等人先前對這項工作所抱持的保留性觀點。<sup>55</sup> 不過，持平而論，自淪陷區搶購搶運物資，任務不可不謂之艱鉅，傳記作者良雄將之視為「經濟作戰史上之一奇蹟」的論調，多少仍可以徵見戴笠及其同志在戰時的經濟動員年代所敷陳的傳奇工作色彩。<sup>56</sup>

## 肆、將「視聽」導往「天聽」： 戴笠的舉報及其他

《戴笠史料》經常也反映了戴笠在政治、情報圈的親見親聞，堪可視為官場帷幕背後的珍貴一手報導。我們從這批檔案得到的總體印象，戴笠的行止堪稱頻繁，自謂每到各地視察，常「隻身遍入社會各階層」，藉求視聽。其探查所得，既有土劣政治，也有貪污不法。有時候，戴笠呈給蔣介石的報告，還會強調派系政治帶給地方的惡劣影響，冀圖藉此糾繩所謂的「黨部同志」（力行社幹部慣用語，意近似前文提到的「黨方」）。例如1942年，戴笠前往陝西、甘肅、河南等省視察轄管部門，據稱在甘期間獲悉各地縣長催糧而濫用笞刑情事，張掖縣長邵

<sup>54</sup>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43年3月14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4-019。

<sup>55</sup>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傳》（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62年），頁162。轉引自張霈芝，《戴笠與抗戰》，頁233-234。

<sup>56</sup> 良雄，《戴笠傳》，頁308。

某甚至結合馬步芳部韓起功軍隊「向人民需索，其本人復從中貪污」，施刑且打死一人，導致「地方大嘩」。及至譚輔烈騎十師取代韓起功駐防，委請邵代徵草糧，詎料受辱。戴引述：邵甚至有以「中央軍尚要地方官辦差，曷若韓起功部之不調走為佳」相譏者。<sup>57</sup>

報告強調了這位張掖縣長具有「中央政治學校學生」背景，話鋒暗示邵的資歷不脫陳果夫昆仲之影響力；續稱「現甘肅八區有七個專員係果夫、立夫兩先生有關」，「不健全」，且「不能與中央部隊合作」，「處處與軍隊謀對立，帶兵同學均甚苦之苦之」。戴笠認為省主席谷正倫主持甘肅政治「雖圖竭力整飭」，終究「環境特殊，基礎太壞」，復稱「現駐甘之中央部隊均歸三十四集團軍指揮，胡總司令（按：胡宗南）對果夫、立夫兩先生亦甚尊敬，斷不至令部屬與黨部有關同志發生意見」，戴表示自己告誡過軍統同僚「與黨部同志係兄弟手足，不應對立」，敦勸過黃埔同學「與黨部同志應和衷共濟、分工合作」，然而基於舉報所述內容，戴笠向最高領袖表達了悲歎與憂懼之情：「今事實如此，一切反動份子均有所乘矣。」<sup>58</sup>

戴笠的報告自有其本位立場，然其陳述韓起功等聚斂情節，部分確是重慶久聞之事實。<sup>59</sup> 蔣中正接獲報告，迅即電令甘省主席谷正倫查報張掖縣長催糧濫用笞刑及貪污實情，接獲情資的反應堪稱果決能斷。<sup>60</sup> 雖然戴笠基於個人「視聽」的舉報，仍然無從，亦無以改變地方的派系政治結構，也未必能夠藉由「天聽」而立刻將政治派系動輒脫逸秩序的行為予以繩墨，不過有時候，戴笠的舉報內容還是能對蔣的態度，形成較為長期的、積累的潛移效果。舉一個例，抗戰時期，軍統組織與活動範圍大幅擴展，自然難以避免地凌撞了像共黨調查這類的中統傳

<sup>57</sup> 「戴笠致蔣中正報告稿」（1942年3月28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4-0001-008。

<sup>58</sup> 「戴笠致蔣中正報告稿」（1942年3月28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4-0001-008。

<sup>59</sup> 例如1941年監察院長于右任巡視河西，曾遇回民請願控韓。

<sup>60</sup> 「蔣中正致谷正倫電稿」（1942年4月3日），〈民國三十一年三月至民國三十一年六月〉，特交文卷—交擬稿件，《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70200-00014-062；並見「政治革新（二）」，1942-1945年，《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01-050005-003。

統領地。戴笠說過「若輩始終自以為對共黨有辦法」的話，實則也有一爭雄長的決心。他曾在情報工作聯席會議聆聽過徐恩曾的「奸黨情報報告」，迅即手諭幹部，敦促「今後本局對奸黨情報之指導與佈置尚應力求進步」，似乎對於中統的專業表現仍有欣賞之意。<sup>61</sup> 不過，軍統、中統兩局更多的仍是激烈競爭，揆諸1943年戴笠呈遞的一份報告，足資說明雙軌特工機制往往容易淪為競爭對手施以構陷的權謀場。

1943年，中統重慶區辦事處假借「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軍統在重慶所掌握的一個最龐大的、公開的情報機關）名義，派員直趨經濟部，「出手槍威逼」，請走涉有共黨嫌疑的企業司科員潘某，直到當晚始予釋回，然已造成經濟部上下的恐慌與憤懣。蔣中正聽了部長翁文灝的申告後，要求戴笠徹查回報。俟戴親訪經濟部詳詢事件始末，又按當事人所述偵訊地點派員探查，才知道是位於德園，對外並不公開身分的中統重慶區辦事處。<sup>62</sup> 戴笠回報，「似此情形，當係中央黨部以圖掩飾其身份與行動」，他甚至進一步敷論，這正是社會常將「所謂特務工作人員一切之罪惡，均歸諸於生一身」的主要原因。根據戴笠所呈報告顯示，中統假冒稽查處名義逮捕「奸黨」的行動已非首次，考慮到治安甚關重要，而重慶卻又動見中外觀瞻，為了在「防止亂萌」與「安定人心」之間尋求平衡，他敦請蔣中正明令以後凡在重慶市及遷建區內進行搜查逮捕人犯時，必須限由軍統幾個轄下單位負責執行，「並必須攜備搜查證、逮捕證及身份證，以符法令而昭慎重」。<sup>63</sup>

根據徐恩曾祕書張文（張國棟）的回憶，經濟部事件確係中統重慶區假借名義所為，且是出於徐恩曾的指令。<sup>64</sup> 蔣中正弄清原委後至為震怒，有「幹部無

<sup>61</sup> 「戴笠手令」（1941年5月27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3-0005-013。

<sup>62</sup> 「戴笠致蔣中正報告稿」（1943年2月17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6-0005-047。

<sup>63</sup> 「戴笠致蔣中正報告稿」（1943年2月17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6-0005-047。

<sup>64</sup> 張文，〈中統頭子徐恩曾〉，收入柴夫主編，《中統頭子徐恩曾》，頁42-43；張文，〈中統20年〉，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統內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91。

能令人時加氣憤，而徐恩曾等專貪他人之功以為己功，無識無智，更為可鄙」之語，並寫手令給徐，內容大意和戴笠稍前的建議是一致的：捕人之事，應由有權機關辦理，中統是黨務機關，不得捕人。<sup>65</sup> 張文對於1943年經濟部事件的回憶，其實是做為1945年徐恩曾被褫奪本兼各職、永不錄用的遠因而鋪述的。總的看來，徐的事業悲劇仍是由多種複雜因素、背景交織形成，但是張文願意強調經濟部事件開啟蔣之信任日墜的過程的特殊地位，我們則是從上揭報告以及更多的特工人員憶述文獻當中看到，在這個信任日墜的過程裡，著實不無摻雜戴笠持續舉報的事例。

所謂舉報，既涵攝了對手、對象之脫軌行徑，自然也包括戴笠手令所稱「關於奸偽與中統局（即黨方）仇視吾人工作之一節，亦須彙集事實呈報委座」。<sup>66</sup> 揆諸《戴笠史料》，亦不乏「黨方竊取本處電報」<sup>67</sup>、中統攬功，「難免其不朦蔽委座」<sup>68</sup> 等等的記載。凡此，例皆「彙集事實呈報委座」。至於蔣中正的態度也堪玩味：有時候，有「可鄙」之忿語怒對徐恩曾者；有時候，「略為改正字句，抄交立夫先生」，直令戴笠長歎「今後吾人工作更加困難，正所謂『官法遠，私法近』也。吾人今後只有慎密將事耳」。<sup>69</sup>

饒富意味的是，抗戰期間，當戴笠向蔣中正提到汪精衛的特工總部勢力時，曾不忘強調丁默邨、李士群的共黨、中統資歷。<sup>70</sup>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遇刺一節，戴笠方面大約花了10天的時間，根據畢高奎在上海的線報和重慶政治圈

<sup>65</sup> 「貪他人之功」，見事略稿本，1943年2月21日條，〈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二月〉，文物圖書—稿本（一），《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173-021。

「不得捕人」，見張文，〈中統頭子徐恩曾〉，頁42-43；張文，〈中統20年〉，頁91。

<sup>66</sup> 「戴笠手令」（1942年12月13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4-0002-061。

<sup>67</sup> 「戴笠致陳紹平電稿」（1935年8月3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7-0001-007。

<sup>68</sup> 「戴笠手令」（年份不詳，1月20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4-0002-045。

<sup>69</sup> 「戴笠致李果謚電稿」（1936年，月份不詳，10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3-0001-024。

<sup>70</sup> 「戴笠致蔣中正報告稿」（1940年），《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5-0003-019。



內的管道，證明「確係事實」，對於「徐恩曾方面之所為」、「黨方所為」亦能掌握（至於「因行動人員怕死，致失此良機」之句，顯然不中情節）。戴笠告訴軍統上海區，「領袖」、「校座」對丁案未果極表不滿，「已面諭徐恩曾今後不必再做行動矣」。<sup>71</sup>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就在同一時間點，軍統證明了自己在「制裁奸宄」的使命上，能夠獲得不同於中統的完美效果。同在上海，就在丁案發生四天之後，軍統採取行動，將投向汪精衛的重要叛離分子陳明楚、何行健予以「制裁斃命」，據稱此舉「蒙領袖嘉慰」。<sup>72</sup> 根據戴笠的推斷，陳、何案發，「日偽對吾方必索逋益急」，但也自信「吾人在滬權威」因制裁之舉而「業已恢復」，因此進一步詢問「現丁之傷勢如何，吾人有無再進行可能」，「如確能供給丁逆之行動，事成吾人准給獎五萬圓」，一方面則鼓勵上海區各組同志「分別將已定制裁目標切實查明其行動，於舊曆年內積極進行，以期有更大成績之表現」。<sup>73</sup>

軍統與CC、中統的競爭激烈，若干問題不免也讓戴笠多有敏感，保持戒心。本文前面提到曾養甫就運輸統制局監察處處長職，表示「用人唯賢」，主張從桂永清的戰幹團調人，戴笠的反應有所保留，此或多或少和戴、桂尚未擁有日後的深摯交誼有關。1939年，戴笠據聞陳立夫、曾養甫在香港組織「健行社」，「我方同志亦有參加者」，曾命香港區區長王新衡查明。<sup>74</sup> 1941年，軍統局代理主任秘書毛人鳳簽請戴笠同意每期遴選工作人員 2 名保送中央政校「人事行政人員訓練班」受訓，戴笠批復：「中央政校此舉，完全係侍從室第三處圖掌握各公開機關之人事也，本局職責特殊，不必保送。至對人事處理辦法之改進，吾人應於實

<sup>71</sup> 「戴笠致燕驥電稿」（1940年1月1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6-0004-046；「戴笠致燕驥電稿」（1940年1月12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6-0004-050。

<sup>72</sup> 「戴笠致朱嘯谷電稿」（1940年1月3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6-0001-023；「戴笠致張行深電稿」（1940年1月3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6-0004-029。

<sup>73</sup> 「戴笠致朱嘯谷電稿」（1940年1月3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6-0001-023；「戴笠致燕驥電稿」（1940年1月1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6-0004-046；「戴笠致燕驥電稿」（1940年1月12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6-0004-050。

<sup>74</sup> 「戴笠手令」（1939年9月25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1-0001-040。

際工作之經驗中潛心研究，隨時注意，以求進步也。」<sup>75</sup> 又如東南亞工作本為軍統境外活動的重點，「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成立後，活動更為積極。這時，國民黨中央秘書處曾就南洋地區統一工作事宜，擬邀軍統會商，戴笠則是認為「在南洋淪陷區之工作如統一指揮，頗為不利，此事無與中統局合作之必要」，情態之慎，似乎和前面所提戴笠對於幾個機關「統一事權」之厚望迥然不侔。<sup>76</sup> 凡此種種，顯然又是雙軌體制共賽共競之下值得進一步深思的課題。

## 伍、結語

對於國民黨中國時期的派系政治，以及國家諸多政治部門所存在的雙軌體制現象，學術工作者和政客當事人經常導往這樣一種解釋模式，也就是蔣中正為了維持其最高統治者的「制高」地位，所祭出「分而治之」的「制下」手段，以保證任何一支旗下隊伍，都不致獨大的發展成為威脅性十足的政治巨獸。這種解讀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往往也忽視了時代結構因素施加給蔣的制約性思考。特別在一個從傳統朝向現代化浸潤，並仍在持續塑造的情報工作領域當中，最高統治者以「耳」與「目」的雙軌形式求取「兼聽則明」，用兩兩競爭、共賽共競的辦法來確保幹部行動的驅力與熱情，思考的出發點不可不謂之精微智巧，只是實際做來，多半也得臣服在派系圈圈的本位意識底下，付出「耳目相爭」的代價。

本文根據《戴笠史料》與《蔣介石日記》等新資料指出，蔣中正早在1935年就已著手思考力行社與青白團的合併問題，這對黃埔陣營的內部情緒造成了衝擊。戴笠的幾份電報並顯示，直到力行社解散之前，都還存在著一個橫跨力行社、青白團，名為「三民主義革命同志會」的組織，為蔣中正所樂許。該組織可能被賦予了團結跨派系幹部的使命，但似乎仍沒有辦法澄清力行社的不安氛圍。

其次，抗戰期間，由於國家與社會的總體動員，以及戰事、民族主義所屢屢

<sup>75</sup> 「戴笠批示」（1941年4月21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07-0003-050。

<sup>76</sup> 「戴笠批示」（1943年8月19日）《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13-0002-010。

激揚的諸多非常使命，使得戴笠與CC的特工勢力獲得了更多擴充的機會。恰恰是因為這種「資源擴充」（而非其他政治場域所呈現的「資源有限」），我們才看到了國民黨中國特工事業內部更多的政治對立。關於戰時的別動隊伍、郵電檢查，以及戰時新興的運輸統制、搶購搶運等工作，戴笠面對CC、中統勢力的競爭，對於人事與事權均有所堅持，多少也是本位意識與本位利益交相揉雜後的自然反應，相較於戴對南洋統一工作之意興闌珊，這些都容易留給人們所謂政治傾軋、派系自衛的印象。

最後，從戴笠對於事業對手的舉報材料當中，我們得以看到戴為自己與軍統呈現了一個派系傾軋、構陷下的弱勢形象，蔣中正的反應或仲裁不一定總能符合戴的期待，遂讓這位心緒敏感的軍統當家者有時也要興起「官法遠，私法近」的感慨。無可諱言，在一定程度的線性時間之內，蔣中正所設計的雙軌體制有助於強人統治基盤的迅速鞏固，不過往往仍要付出軌道中人滋生怨望的代價。戴笠盛年時期所稱「吾人不圖今日特工之統一」與官私之悵，陳立夫晚年回憶所言昔日中央組織部調查科同仁發現戴笠也「在做類似工作的時候」，咸「憤憤不平」，「謂蔣公是否對我們不信任」云云，其實都是類似心理的反映。<sup>77</sup> 總的看來，情報事業可以被視為多稜鏡的隱喻，它折射出色彩繁複的時代主題，不同的側面則是組成了真實的全貌。當「英雄無名」的理念、「無名英雄」的風範替情報事業掙得了專業的尊嚴時，這個事業所折射出的更多色彩和擁有的更多側面如派系政治者，同樣值得正視。

---

<sup>77</sup> 陳立夫，《成敗之鑑》，頁106。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國民政府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政治革新（二）〉，1942-1945年，典藏號：001-050005-003。

《蔣介石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1932-1938年，Boxes 36-39。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至民國三十一年六月〉，特交文卷一文擬稿件。

〈民國二十四年（三十九）〉，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呈表彙集（六十八）〉，特交檔案—一般資料。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七年五月〉，文物圖書—稿本（一）。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二年二月〉，文物圖書—稿本（一）。

〈淞滬會戰與南京撤守〉，革命文獻—抗戰時期。

《戴笠史料》（臺北，國史館藏）

「王撫洲電文摘由紙」（1943年3月13日），典藏號：144-010110-0001-050。

「鄭介民、戴笠致賀衷寒電稿」（日期不詳），典藏號：144-010110-0007-048。

「戴笠手令」（1939年9月25日），典藏號：144-010101-0001-040。

「戴笠手令」（1941年5月27日），典藏號：144-010113-0005-013。

「戴笠手令」（1942年12月13日），典藏號：144-010104-0002-061。

「戴笠手令」（年份不詳，1月20日），典藏號：144-010104-0002-045。

「戴笠批示」（1941年4月21日），典藏號：144-010107-0003-050。

「戴笠批示」（1943年8月19日），典藏號：144-010113-0002-010。

「戴笠致王新衡電稿」（1938年5月21日），典藏號：144-010113-0003-070。

「戴笠致朱嘯谷電稿」（1940年1月3日），典藏號：144-010106-0001-023。

「戴笠致李果謚電稿」（1936年，月份不詳，10日），典藏號：144-010113-0001-024。

「戴笠致胡宗南電稿」（1938年4月8日），典藏號：144-010101-0002-060。

- 「戴笠致張行深電稿」（1940年1月3日），典藏號：144-010106-0004-029。
- 「戴笠致陳紹平電稿」（1935年8月3日），典藏號：144-010107-0001-007。
- 「戴笠致蔣中正報告稿」（1940年），典藏號：144-010105-0003-019。
- 「戴笠致蔣中正報告稿」（1942年3月28日），典藏號：144-010104-0001-008。
- 「戴笠致蔣中正報告稿」（1943年2月17日），典藏號：144-010106-0005-047。
-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3年10月1日），典藏號：144-010111-0004-049。
-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3年12月13日），典藏號：144-010111-0004-047。
-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3年2月3日），典藏號：144-010111-0004-056。
-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7年8月17日），典藏號：144-010112-0002-075。
-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37年9月10日），典藏號：144-010105-0004-031。
- 「戴笠致蔣中正電稿」（1943年3月14日），典藏號：144-010105-0004-019。
- 「戴笠致鄭介民並轉劉培初、胡天秋電稿」（1940年4月26日），典藏號：144-010105-0003-005。
- 「戴笠致鄭介民電稿」（1936年2月9日），典藏號：144-010111-0004-008。
- 「戴笠致鄭介民電稿」（1938年5月17日），典藏號：144-010105-0005-031。
- 「戴笠致鄭介民電稿」（1939年10月10日），典藏號：144-010105-0005-032。
- 「戴笠致燕驥電稿」（1940年1月12日），典藏號：144-010106-0004-050。
- 「戴笠致燕驥電稿」（1940年1月1日），典藏號：144-010106-0004-046。

## 二、憶述文獻

- 康 澤，〈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11月），頁197-207。
- 劉介魯、吳汝成，〈我們所知道的徐恩曾〉，收入柴夫主編，《中統頭子徐恩曾》（臺北：新銳出版社，1994年），頁81-93。
- 陳立夫，《成敗之鑑：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
- 沈 醉，《軍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5年。
- 張 文，〈中統頭子徐恩曾〉，收入柴夫主編，《中統頭子徐恩曾》，頁1-58。
- 張 文，〈中統20年〉，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統內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頁1-115。

### 三、專書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

王良卿，《改造的誕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

良 雄，《戴笠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

國防部情報局編纂，《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62年。

張霽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年。

楊者聖，《特工王戴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社史》。臺北：實踐出版社，1984年。

Ch'i, Hsi-sheng,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Wakeman, Frederic E., Jr., *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四、期刊論文

葉文心撰，張和聲譯，〈城市中的戰爭與地下抗戰：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特工秘密機構的俠義之風〉，《史林》，2004年第3期（上海，2004年6月），頁98-107。

國史館館刊 第 33 期